



大唐的气度



□ 徐问笑

作为继隋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大唐以其光耀万世之辉的文治武功，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千年以来，大唐一直承载着后世之人对于盛世王朝与明君的无限向往之情，盖因大唐的荣光和风采，一如唐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推崇的境界，只能属于大唐所独有的存在。故钱穆先生曾感叹道：“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同时，他又言道：“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究其原因，唐朝的君主，较之于历代君主，更加有王者的大风范、大胸襟，故而大唐可以做到“有容乃大”，其恢宏之气度足令千古仰望。

—

中国历史上，有容人之量的开国君主并不少见，但是，如果必须加上“自始至终”这个限定词时，那就真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反倒是“鸟尽弓藏”的戏幕演了一出又一出。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皆有屠戮功臣之恶名；宋太祖相对温和一些，但亦有“杯酒释兵权”之历史典故流传。在这一点上，就不得不赞扬一下唐高祖李渊与唐太宗李世民这对厚道的父子了，尤其是唐太宗，他善待功臣，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终贞观一朝，除了侯君集与张亮因事涉谋逆之罪而不得善终外，其他人皆是非公即侯、显赫至极。并且，他还能不计前嫌，重用昔日敌对自己的臣子，其心胸之宽广，堪称历代君主之最。

魏征的千古谏臣之名，在历史上可谓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某种程度上，亦要归功于唐太宗的成全。魏征其人，原是东宫属官，用通俗的话说，他是李世民敌对阵营——太子建成的小弟。众所周知，李世民在成就大唐江山基业方面，有定天下之大

功，可以说，若无李世民，即无大唐王朝，故李渊曾一度对其许以太子之位。遗憾的是，唐王朝建立后高祖却言而无信，反立战功平平的建成太子。如此一来，不独李世民心气难平，建成亦是心存“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不安。

夺位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但难能可贵的是，在“玄武门之变”后，不独曾献策于建成太子、提出对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之建议的魏征，没有受到李世民的“秋后算账”，且其他东宫追随者亦不曾受到牵连。譬如同是东宫旧属的王珪，更因辅佐有功，得以名列唐初四大名相之中，可谓大放异彩。而在官变中，与李世民一方竭力厮杀，在明知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率东宫兵马力战，甚至反扑秦王府的冯立、谢方与薛万彻等将领，也皆在贞观一朝中被委以重任，其中薛万彻更是进爵郡公且被招为驸马。按理说，如此“犯上”之辈，不杀不足以立天子之威，但李世民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对他们的武勇赏识不已。他说道：“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唐太宗一代帝王之胸襟、气度由此足见矣。

骆宾王所撰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堪称历代檄文中代表之作。然作为被讨檄、被羞辱的武则天而言，这篇檄文中不乏大量人身攻击之字句，其行文之阴损、用意之险恶，简直是在挑战人类忍耐的极限。然而，武则天一开始竟是“嬉笑自若”，直至后来听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之句时，却不禁激赏之极，由是惋惜不已：“如此之才不为朕用，乃宰相之过也。”此言一出，这位旷古绝今的女帝仅凭其这份惜才容人之大器量、大胸襟，便胜过古今来多少帝王。

在历史上，功高盖主者往往多以悲剧收场，但唯有郭子仪，权倾天下而主不忌。他不但生前位极人臣，死后亦荣荣至极，且八子、七婿皆是朝中重臣。中国传统戏剧中有“醉打金

枝”的曲目，讲的便是郭子仪之子郭暧借酒生事，醉打升平公主一事。虽是民间演绎，但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确实有这么一段描写：“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别以为你有个做大天子的爹就了不起，那是我爹不屑得做而已。郭暧之言，甚至不能用大胆或者狂妄来形容了。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就凭这句话，郭子仪及其家族被安上一个“谋逆”之名也绝对一点不冤，若是运气差点，再遇到朱元璋那样的皇帝的话，更是十个郭子仪也不够杀的。然而就像“醉打金枝”的结局一样，这场小夫妻的口舌之争，最终因唐代宗的宽容与大度而没有演变成一场政治悲剧。不过，为逞一时口舌之快，敢跟公主争高下的郭暧，也幸得生在大唐，否则绝对会作为“荣列”史书上坑爹典型之榜首而遗恨千古。

二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盛世的大唐处处呈现出一派雍容、恢宏之气度，繁华、富丽的长安城俨然一块巨大的磁石，不但吸引着周边君主、使臣的虔诚朝拜，甚至于远近的客商、僧侣、匠人、胡姬也纷纷而来，且一个个流连忘返，竟是一见长安忘故乡，从此“我心安处即吾乡”了。作为其时世界上最为辉煌壮丽、相当于明清北京紫禁城近五倍之大的宫殿群，大明宫这座东方圣殿影响了当时东亚地区的多个国家宫殿的建设，一度被誉为千宫之宫。诗人王维曾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句形容大明宫的宏大、雄伟，以及万国朝拜的壮观盛景。

可以说，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巅峰王朝，大唐不但以其辉煌的就或与灿烂的文化雄视千古，且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能够平等对待异族、真正体现泱泱大国之胸怀和气魄的王朝。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原王朝与塞外民族

一直战火不休，但在大唐的太宗至代宗期间，西、北诸民族共尊大唐皇帝为“天可汗”，亦意为万王之王。在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外族在朝廷为官者高达三千多人，其中宰相有二十九人，因此，大唐王朝的强盛，亦离不开他们的辅佐之功。然可惜的是，强盛的大唐王朝终因“安史之乱”而急转直下，有人便以祸首安禄山的异族身份大做文章，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唐之失即在于此。此诚不确也。须知帝位委实是古往今来最具诱惑力之宝座，涉及皇权之争，骨肉亲情尚且不顾，更遑论同族、异族之分了。譬如贞观一朝中，昔日突厥王族的阿史那社尔，以及曾为一族可汗的契苾何力，此二人降唐后皆是为大唐四处征战功勋卓著。太宗去世后，他们在悲痛之下，竟自请杀身殉葬，以报太宗知遇之恩。

大唐王朝因内有中原文化的熏陶与滋养，外有少数民族豪放、粗犷之气的影 响，故此其治国理念颇具兼容并蓄的精神。再加上唐太宗以其“王者大无私”之胸怀治理天下表率在前，故大唐的整个社会氛围才能够空前的开明、开阔与开放，甚至其后近千年的王朝统治中，亦不复如此气度。

三

通过唐时民间的婚姻礼俗，我们亦能看出唐人的心胸宽广。譬如今人自敦煌发现的“放妻书”，其中便有这样一段话：“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分明是丈夫对离婚的妻子再嫁表示了美好的祝愿；更有甚者，在其妻再嫁后遭遇不幸时亦能够施以援手。《旧唐书》中即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严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时王元琰坐赃，诏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在这里，严挺之乃朝廷高官，而王元琰则是其前妻的现任丈夫。王元琰出事 后，严挺之正好负责此案，他发现此案证据不足，于是奋力营救王元琰，作为前夫的他不但未曾落井下石，反而积极营救。这也说明了唐人的气度，确实非同一般。

可见，唐人不论身居朝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具有一种豁达、包容的精神。惟其如此，唐玄宗能够忍受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慢，白居易可以在《长恨歌》中讽刺先皇，而皇室不但不追究其“大不敬”之罪，唐宣宗继位后，还曾下诏任命白居易为宰相。在得知白居易已离世八个月 后，唐宣宗在惋惜与悲痛之余，居然以唐子之尊写了一首《吊白居易》的哀悼诗，将其作为“白粉”之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唐诗冠绝古今，同为诗界天才级人物，“文人相轻”在李白与杜甫之间并不存在，更没有“瑜亮之叹”。两人的交往，自始至终，都拥有如朗朗如日月之胸怀。

中华春秋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是人类 的伟大时期，人类精神基础得到完善和奠定，终极关怀觉醒，一大批元典问世。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各地域规模化地出现了一批思想宗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他们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至今影响着人类的精神和生活。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交通和信息都闭塞不通，但不同地区创造的精神和文化却有着非常相通的地方。

尽管在这个时代之前，各地域文明都“厚积”已久，但“薄发”的景观更壮丽可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给这个时代贴了一个标签“轴心时代”。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在《人的历史》一书中，雅斯贝尔斯也论及那一时代。指出那一时代“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开始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思想者的时代。在印度，是优波尼沙和佛陀的时代。在波斯，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提出它挑战式的论点。在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等先知。希腊产生了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悲剧诗人们，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等。

今天我们精神的基 础，仍是这些人类先哲们创造的东西，我们没有超越。这正如雅斯贝尔斯指出的：“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后来很多历史学家都谈到过这一时代的伟大之处。如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和拉尔夫在他们的《世界文明史》中提到：“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或许仅仅由于巧合——在古代世界的三个相隔很远的地区，在大约同一个时候都开展着高度的哲学活动。当希腊人正在探讨物质世界的性质、印度思想家在思考灵魂和神的关系时，中国的圣人正试图去发现人类社会的基础和贤明政治的根本原则。”

坊间俚语说：“一岁看八岁，八岁定终生。”是说一个人到七八岁时，大致可看出其一生之端倪。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个伟大时代，有点类似于人类“八岁”期，亦可洞悉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粗像轮廓。

严格意义上讲，最早提出“轴心文明”这一命题的并不是雅斯贝尔斯。在更早的时候，如1856年拉索尔克斯在他的《历史哲学新探》中就提出：公元前600年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们、罗马的努马王，以及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多利安人和埃及人的首批哲学家，全都作为民族宗教的改革者而几乎同时出现，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事情。

到了1870年，维克多·冯·施特劳斯也说到：在中国老子和孔子生活的数百年里，所有开化民族都经历了一场奇异的精神运动。在以色列，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和哈巴谷作着他们的预言，而新一代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二座圣殿（公元前521—516年）。

在中国，闻一多先生较早论及了“轴心时代”现象。1943年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指出：“人类在进化的途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雅斯贝尔斯秉承了先哲们的思想，从未从整体上把握这些获得当时人性的整个精神存在的普遍类似现象”。雅氏论述这一命题是想“从整体上把握这些获得当时人性的整个精神存在的普遍类似现象”。

还有一点在我看来非常重要，那就是雅氏深刻指出的：与人类的“轴心时代”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下降，只有一点可与以前比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今天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人类从技术上造就了“第二自然”，但危险在于，人类的全部存

人类『轴心时代』的思想光芒

□ 秦德君

在变质为技术完美的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一切根基。

也许这正是“轴心时代”理论的现实映照价值。“轴心时代”成为人类文明和精神的一种经纬，是今天我们更好地反思、洞悉人类社会状况的一个坐标。

值得惊叹和进一步思考的，不仅是“轴心时代”人类思想宗师们林林总总的伟大智慧本身，更在于在一切似乎都还原始、落后、不发达的那个岁月空间里，这些伟大智慧的渊源究竟来自哪里？

在我看来，人类伟大智慧最主要的是来自对大自然最直接的体悟。苍苍茫茫的大自然，日月盈昃的田畴原野、千层叠嶂的山峦和深厚的大地土壤——正是这些“最本原的物质”，使人们获得了生命根基。大自然是人们最直接、最丰富的精神课堂，是先人们获得灵感和沉思不竭的源泉……

思想和精神只是辽阔土壤中生发的“自然之果”。当我们越来越远离大自然，远离土地，远离草长莺飞，远离碧水雄山，只是偶尔与大自然打个简单照面，就体会到我们浅表和没有根基的状态。我们的心是飘浮的。如果说现代人有什么“本质”的话，这个本质就是把人从土地上拔出来，将人整合在都市的钢筋丛林和现代化的横平竖直中逡巡穿行。

人的灵魂是一棵树，须扎根于土壤，有泼洒的阳光雨露，才能“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才能郁郁葱葱。缺乏深厚土壤和风云雷电的激荡，就会如超市里出售的那些温室植物，不会有多少生命力。

只有在苍茫大自然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生发的东西才会成为“元典”。没有大自然生发的灵感和“元精神”，就不太可能有真正穿越时空和历史本质的东西。今天，我们身旁充满了华彩，却缺乏深沉和雄浑。这也没什么，只是我们不要把华彩和浅薄装点成雄浑和宏大。

本质上，今天我们缺乏睿智。睿智是很有重量、能瞥见星光的东西。

有所思

文侯为何送给乐羊一箱告状信

——魏文侯用人史话（一）

□ 陈家兴

战国时期，各国人才辈出。然而，独有秦国最后一统，一个重要原因 在于秦国连续有四位雄主，更成为重要人才的净流入国。山东六国则成为贤能之士的净流出国。从一定意义上说，山东六国有贤能而不用，等于是为秦国培养了大批贤能。如此，秦国焉能不强盛，六国焉能不相继而败？

其实，山东六国也并非没有雄主，所以都能称雄于战国当世。遗憾的是，其主虽能，往往一任而已。一任之后，往往一改此前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之风，以致贤能之士争相出走。

比如魏国，战国时期那些名震天下的贤能之士，如吴起、商鞅、孙臧、乐毅、张仪、范雎、尉繚等，皆从魏国流失而在他国建功立业。在一定意义上说，魏国简直成为秦国治国大才的培养基地，可谓貽笑千年，至今仍令人扼腕，更启人深思。

事实上，魏国也曾强盛过，甚至是进入战国时期最先雄霸天下的国家。这发生在魏文侯魏斯任上。

三家分晋之后，魏斯于公元前

403年被周威烈王分封为诸侯国君，是为魏文侯。魏斯任命卜子夏、田子方为国师，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以示尊敬。如此礼贤，便有“四方贤士多归之”的效果。

魏文侯的用人谋略，在用乐羊上很有代表性。当时，三家分晋之后，中山国无所专属，文侯谋而伐之。翟璜便推荐乐羊，其子乐舒却在中山为官，文侯不以为意，用乐羊领兵。这即见文侯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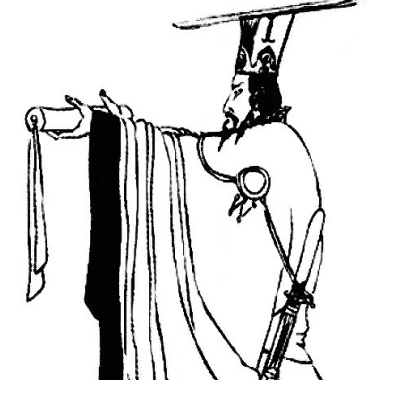
及至乐羊围城，中山子姬窟便以乐舒为要挟不断求宽限，如是者三。而文侯左右本就妒忌乐羊骤得大用，见其总是不攻，便在文侯面前说他的坏话。但文侯把群臣的告状信都封在匮内。

后来，姬窟把乐舒烹成羹送给乐羊，想以此使乐羊悲恸而不能战，没想到乐羊够狠，直接就在使者面前吃了一杯。文侯对睹师赞说：“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很有点感激感动的意思。但赞说道：“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这是管仲怀疑易牙的逻辑，意谓用这样的狠人，将来风险很大。

乐羊攻下中山后，文侯为之设宴庆贺，宴毕送他两个箱子。乐羊以为珍宝，打开却是群臣的告状信。乐羊见后仍拜谢文侯：“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而后文侯封乐羊为灵寿君而罢其兵权。对此，《战国策》写道：“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乐羊取中山的故事，千百年来多有解读。乐羊攻城未成之时，文侯能用人不疑，这正是雄主长处，其后的齐威王亦是。是以，乐羊的“军功章”有文侯的一半，并非妄言。功成之后，送给乐羊一整箱告状信，既是把自己的信任通达给对方，也有促其效忠的用意，可见文侯治人之智谋。封其灵寿君，以示有功必赏，也是赏得其所。惟罢其兵权多 有争议。据称当时翟璜不理解就说，文侯你既知乐羊之能，为何不用他将兵备边，怎么能让他赋闲呢？文侯笑而不语，还是李克为翟璜点破。

用人首先重德，德又首先重其忠，千古一理。乐羊食子之羹，够凶狠，如上所言连自己亲骨肉都吃，将来他会上不食谁？如果日后出现特定条件，他就可能对君主不忠。不忠，当然是用人之大忌。如鲁迅所言“无



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可惜乐羊没有作出有情的选择，当时的情形是否真如刘向在《战国策》中所言“乐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难道不食子就无他法以强化攻城 的信心与决心，必须以损害为父之道而全法向之尊严？也可能是乐羊想通过食子来向文侯表示忠心以决意攻城，结果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个故事至少提醒人们，不能挑战做人的最基本底线。

选人用人史话